



JJXB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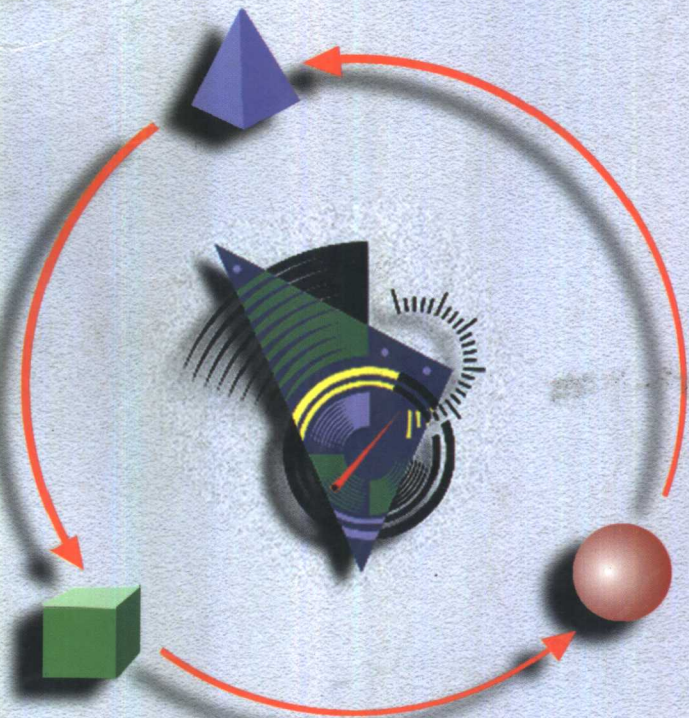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丛

JING JI ZENG ZHANG YU GUO FUANG FEI GUI MO

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

国防费结构效应论

万东铨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丛

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

——国防费结构效应论

万东铖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万东铨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10

ISBN 7-5017-4205-7

I. 经… II. 万… III. 经济增长-关系-国防支出-研究
IV. F81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504 号

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5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ISBN 7-5017-4205-7/F · 3035

定价: 20.00 元

本书是：

**哲学社会科学
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总 序

庄 毅

世纪之交，中国需要思考。

放眼世界，我们在为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而自豪的同时，又需面对震撼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国际贸易集团化壁垒，周边国家以各种优势对我国出口和外向型经济展开的竞争等诸多挑战。

立足国内，我们欣喜于翻两番目标的提前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同时实现，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人们甚至已开始讨论轿车进入平常百姓家的问题。但市场却又在疲软，物价、利率的下降并不能刺激买方市场，黄河断流、淮河污染，大自然对人们发出警告，几千万下岗工人正在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在我们讨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战略性改组，讨

论农村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时,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来临。土地、资本等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为人们所追求和梦想的东西将逐渐为知识、信息所代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起到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我国工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只占10%,许多农民还处于“搞饭吃”阶段,经济建设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十分缺乏。

我们还要思考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进行粮食购销体制、金融体制、住房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等等。

世纪之交,我们面临太多的挑战、问题和困惑。我们需要严肃的思考、认真的研究。许多人正在到处寻找答案。

“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丛”的应运而生,为回答这些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她是我国近百名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成果精华的展示。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经济学博士后们在站期间即已完成的,有的则是出站后的新作。其内容既有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也有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的。他们的研究所具备的理论上的前沿性和实践上的战略性,除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贡献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决策部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学博士后科研工作开展的时间还不长,而经济

学博士后们也都比较年轻。他们是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是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里的一支生力军。我不敢说他们的理论都十分完美，他们的观点都非常正确，但我敢说他们是一群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关心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人，是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乐于奉献、辛勤耕耘的人。改革开放需要一大批真正有理论功底、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的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大批真正有建树、有见地、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著作。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自1985年诞生起，迄今已累计招收了近8000名博士后人员。在走上新工作岗位的4100多名博士后人员中，许多人成为科技骨干和学术技术带头人，不少人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甚至院士，有的还在广阔的经济建设舞台上找到自己大展宏图的用武之地。年轻的博士后已成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界一支活跃的力量。“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丛”是以经济学博士后为对象，系统推出他们的观点和著述，她为热心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年轻的博士后们提供了一块热土，使他们的著作正式出版，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丰富中国的经济学。我们在为他们喝彩的同时，也要为组织这套丛书的策划者、编辑和中国经济出版社叫好！

作为一个博士后工作者，我衷心希望“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和支持，更希望她的问世能推动更多的人，脚踏实地站在中国的土

地上，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1998年6月20日

（作者系国家人事部党组成员、专家司司长，中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cale of Defense

Spending

—On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Defense Spending

(Abstract)

It is fou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defense spending is still confined to the simple quantitative aspect of defense spending.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aspects of defense spend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former aims at getting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 inputs while the latter centers on increasing the benefits of defense spending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scale capacity. Therefor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quantity" must be supported by "quality".

In the light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the status quota of defense consumpt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defense spending must have an optimal growth, which is defined as a band interval between an upper limit and a lower limit. The upper limit is decided by the maximum military demand and the maximum possible military supply, and the lower limit by the short term factors of defense spending growth. On one hand, since the average maximum possible growth rate of defense expenditures reflects the long term average maximum possible capacity of national economy

to stand the growth of defense expenditures, it actually indicates the maximum possible military supply. And the maximum military consumption naturally indicates the maximum military demand. On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rat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r year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causing the average of the high and the low growth rates in various years to be a 'guaranteed' growth rate, which is actually one that excludes the maximum possibility and the maximum impossibility. This 'guaranteed' growth is viewed as the lower limit of the proposed optimal growth, which lies in the interval set by these two limits. Assume that O_A is the optimal growth rate, O_m the average rate of maximum possible growth and O_p the real average growth rate in a given period, then the optimal growth interval for defense spending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under abnormal conditions, when $P_M < N_M$,

$$O_p \leq O_A \leq O_m$$

otherwise, under all other conditions,

$$O_p \leq O_A < O_m$$

with quantity fixed, the quality factor becomes more prominent. The growth of quality lies i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of scale capacity of defense spending is in essence the issue of structural connections. The notion of structural connections refers to the overall three-dimensional spending-benefi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ub-systems, not merely the two-dimensional proportions.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circles currently view the structural connections as simple balanced proportion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ubsystems. This view is not helpful in revealing the overall structural connections and thus exerts constraints on studies in this area. In this paper, a three-dimensional spending-benef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systems is forwarded. This view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dimensional vector sub-systems. The three vectors are the level of structural connections, i. e. the level of spending-benefit among the sub-systems; the scale of structural connections, i. e. the scale of spending-benefit in the sub-systems; the structural aggregate quality, i. e. the quality of spending-benefit in the sub-systems. To conclude, the growth of the scale capacity of China's defense spending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ructure of defense spending, during which innovations on regulations need to be deepened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目 录

总 序

导 论..... (1)

一、选题意义与立论假说..... (1)

二、研究范畴与概念解释..... (5)

三、分析方法与结构体系 (12)

第一章 国家与“安全稳定”产品的供给 (16)

一、利益最大化：政府经济行为的追求 (16)

二、政府直接投资：“安全稳定”产品的有效供给..... (28)

三、社会化：国防投入物产品供给的趋势 (50)

第二章 最适度增长：国防费与经济协调发展的

理性选择 (71)

一、经济发展阶段孕育着不同国防费增长模式的

形成 (71)

二、中国国防费增长模式的现实约束..... (105)

三、最适度增长：一个新的中国国防费增长模式..... (123)

第三章 结构关联：一个新的国防费结构理论框架..... (142)

一、三维向量：国防费结构的立体构成..... (142)

二、结构关联水平：国防费规模内涵扩大的元素..... (159)

三、结构关联规模：国防费规模成长的动力..... (180)

四、结构关联质量：国防费有效规模形成的基础..... (200)

第四章 结构弹性效应：国防费规模软扩展	(209)
一、最终国防需求变量的引入：国防费结构效应分析的 深化	(210)
二、国防费结构弹性效应的评判	(221)
三、两种状态下国防费结构弹性效应分析	(238)
第五章 结构升级：中国国防费规模成长的途径	(256)
一、国防费结构升级效应理论分析	(256)
二、中国国防费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276)
三、结构升级：中国国防费规模成长的支点	(286)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 论

和平 (Peace) 与发展 (Development), 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尽管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当今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 世界战争是打不起来了。在这种大环境中, 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首脑已经意识到: 一个国家的强弱, 不是只决定于军事力量, 而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综合国力 (National Power)。于是, 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进行着自己的战略调整: 从以军备竞赛 (Arms Races) 为主转向以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为主, 以便在未来的更为激烈的竞争中获胜。观察家们认为: 今后和相当长的时期里, 美国、苏联^①、日本和西欧国家将展开异常激烈地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竞争, 并把提高综合国力当作争夺新世纪战略优势的主战场。因此, 发展综合国力不仅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 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主要战略目标。

国防费, 作为综合国力形成的直接因素, 其研究必须引起理论界的重视。特别是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关系的研究, 更应引起理论界乃至各国政府的关注。

一、选题意义与立论假说

国防经济问题的研究, 较其他学科起步较晚。特别是国防

^① 本课题中以苏联为研究对象时, 其论述和数据等, 均保留了“苏联”的概念; 若涉及苏联解体后的研究, 则视其情况而定。

费的研究, 由于它对于政治和军事战略来说太为重要了, 以致于经济学家们不便去对它进行直接调研和考究, 进而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国防投入直接的是某种政治目的的需要, 而政治目的又往往与经济利益难以分开, 经济利益有时会导致政治目的的调整, 影响国家安全形势进而决定着国防费规模的形成。在世界发展支出(科研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①的情况下, 工业化国家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而占国民生产总值6%^②的世界军费却不能进行深入考究, 这不能不说是一缺陷。在我国, 国防费的研究虽然已引起一些学者甚至决策部门的重视, 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诸如国防费与经济的关系、国防费规模及其结构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然而, 我们忽视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道理: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费总是代表着该国一定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因为, 资源一旦用于国防消费, 就意味着放弃其他同样量产品的生产。社会资源总是稀缺的和有限的。在这一命题前提条件下, 用于国防投入的越多, 则用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科学研究乃至经济建设等其他方面的投资就会越少; 相反, 对后者投入多, 则用于前者的资源就少。因此, 当我们考虑扩大包括国防部门在内的任何一个部门时, 必须相应地考虑从这种扩大中所获利益的同时放弃和忽视其他部门利益而带来的损失。

① Sachs, J. and Woo, W.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7, No. 1.

② Gaddis, John Lewis, 1982.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经济学家们有一个基本价值判断：人们都趋向于追求富裕，贫穷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此，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企图通过贯彻经济发展的政策来改善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然而，在国家存在、战争未能最后消灭的前提下，虽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统一的，但毕竟也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作为本国“中心”的同时，国防需求缺口也十分突出。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妥善解决国防供给与消费的关系，进而如何“深化”既定的国防费规模，提高国防费效益等大量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国防经济乃至经济学界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一方面对国防费规模的研究还未能很好的展开，另一方面所进行的某些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对国防费绝对量——国防费数量规模的研究上，而对相对量——国防费质量规模的研究，特别是国防费的结构效应（Structral Effects）的研究还未能涉及。国防费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在运动过程中必定要与相关部门或系统发生联系，产生能量互换。国防费在与外界的能量互换过程中，一方面影响外界其他系统，另一方面也不断改变自身状态。这种不同的关系状态，对于国防费的增长及其规模的形成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经济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然而，在世界国防费规模日趋庞大，总量不断增长的今天，我们总是停留在国防费数量方面的简单增减的现象考察，而忽视国防费的结构效应分析。这种现象的考察和表层的分析，不仅阻碍着国防费深入研究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国防费政策的制定。

上述事实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以下问题：

- 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规模的关系怎样？

- 面临的国际形势怎样,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 国防投资由谁承担?
- 国防费规模的确定有无准则,究竟需要多大“盘子”?
- 国防费规模与国防费结构的关系怎样?
- 国防费结构效应由哪些要素构成?
- 国防费结构效应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发生的?
- 国防费有效规模怎样形成?

很显然,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关系到我国国防费的增长,而且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二者的协调。

实践是理论的先导,理论又指导实践。与以上问题有关,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学理论界开始重视国防费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当然十分可贵。出于同许多国防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同样的责任感,根据我国面临形势的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初步判断,本课题在假设国家存在,战争还未能被消灭的前提下,以中国和平时期国防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为其主题,重点讨论在国防费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国防费结构效应。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发展与国防费关系的分析,揭示国防费增长模式的形成及其规律,探讨国防费数量结构效益型增长以及提高国防费结构效应的途径,进而提出国防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供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考。

显然,这种研究的基本立论就是:协调发展是国防费增长的必要条件,结构效应是决定国防费规模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一立论是以和平环境中国家进行着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为背景的,其理论依据的要点是:

- 国防建设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国防费增长模式;
- 国防费有效规模以“量”为基础,以“质”为核心;